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A Study on Vicissitude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

陈雪芬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 / 陈雪芬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308-08455-0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英语—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H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553 号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

陈雪芬 著

责任编辑 石国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455-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内容提要

中国的官方英语教育开始于 1862 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在 19 世纪上半叶之前,英语曾经被认为是“蛮语”,但在 140 多年后的今天,英语教育却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社会上也出现了学习英语的热潮。是什么原因导致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影响其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中国学习英语的风气、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怎样的沿袭和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为此,本研究试图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总结出英语教育的规律,从而为我国当今的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根据中国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本书分成六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阶段为贸易、传教与英语传播。早期英语传播主要是出于民间贸易与传教之需要。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早期中外贸易中语言——洋泾浜语和早期教会学校英语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特点以及对后世英语教育的影响。

第二阶段为西学东渐中的英语教育。晚清的英语教育是作为西学东渐之媒体而引入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翻译、外交之人才以及学习西方器物的制造,中国的官方英语教育才得以开始。到了维新新政时期,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政府扩大西学的范围并开始重视英语教育。与此同时,受条约、租界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教会英语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些教会学校因其英语教学特色日益受社会青睐。该阶段中国英语教育的总体特点为:教会学校与本土学校并存,大多采用语法翻译法,以原版的教材为主,并确立了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为欧风美雨下的英语教育。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内外交困,急于寻找现代化建设之路,向欧美学习的心情尤为迫切;另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上也有与西方进行日常交流的需求。因此,英语成为外交、中西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等方面的载体,在这一时期英语教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本土中学与教会中学都普遍地采用直接法教授英语,教科书出现了本土化、多样化的趋势。而大学的英文系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本土大学都已属于人文学科,在进行英语语言教学的同时强调博雅教育,非常重视学生英美文学素质的提高。

第四阶段为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英语教育。新中国建立是中国英语教育的一个转折点。从 1949 年到 1976 年,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缩减、复苏、停滞等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教学方法一度出现不正常的钟摆现象,由直接法回复到语法翻译法,同

时教材内容也明显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五阶段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英语教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人们日益认识到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重要性,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英语热”的现象。而政府也对这种需求作出了及时的反应,英语被定为中学教育阶段必修课程之一,高校的英语专业也成为热门专业。整个中国英语教育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英语交际法开始得到推行;教材中反映交际目的的内容比重增加;部分中学使用原版教材作为英语教育改革的试点;少数高校开始提出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英语教育呈跳跃式的发展,并且有向功利型发展的趋势。

第六阶段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加入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中,社会上也随之对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于世纪之交兴起了波及各个层面的英语教育改革,改革的共同点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强调英语教育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学校开展英语教育改革的同时,社会上的英语培训机构应运而生,较有影响力的有新东方、英孚等英语培训机构。这是英语教育变革以及多元化的时代。

综观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历程,从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蛮语”,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之媒介,到国民政府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英语教育的起伏,甚至一度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处于缩减、停滞状态,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后受到国家和社会普遍的扶持和重视,最终到当前的全民学英语用英语的热潮。种种变化无不折射出中国的英语教育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是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

在系统梳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基础上,本书还初步地分析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与其社会物质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不确定因素互动关系,归纳出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过程中,英语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变化的规律。最后还对当前中国英语教育中出现的较为普遍和重要的问题归纳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矛盾关系,如英语教育中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关系,英语教育中的功用性与人文性关系等,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关键词:中国;英语教育;变迁

Abstract

Official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started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Jingshi Tongwen Guan) in 1862. Before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nglish was regarded as a “barbarian language” in China, but more than 140 years later, “English Fever”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What has made the status of English change dramatically and what affects the great change? During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how did the social context of English learning,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English change? Those questions are worth considering. Therefore, the book attempts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background in hoping of offering some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present English reform in China.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the whole book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hase is trade, evangelism and the spread of English. The early spread of English was out of the needs of trade and evangelism. Therefore the book initially traces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idgin and missionary English and their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later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econd phase is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glish became a vehicle for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 Official English education started during the innovative and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with an aim of producing and learning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Opium War. And after Jiawu War,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Qing government, it was decided to expand the range of western studies. English became a compulsory course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s. In the meantim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eaties, lend-lease and foreign cultures, English education developed quickly in missionary schools. Some missionary schools became popular because of their good reputations for English teac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were as follows: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and missionary schools paralleled, most of the schools employed a grammar-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adopted original books as English textbooks and English was established as an important

序一

在晚清之前,英语在中国曾经被视为“蛮语”,可是自从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形成了“英语热”,直到今天方兴未艾。

这一百多年来英语在中国的地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剧变?

中国的英语教育是怎样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并影响着整个社会?

在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当前的英语教育界反思和借鉴的经验?

陈雪芬的著作《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的考察。

陈雪芬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在浙江科技学院从事英语教学十余年,有一定的英语教育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加以在研究生阶段,就读于浙江大学教育系,进行比较教育学、教育学基本原理以及教育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使她能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得以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入手,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不同历史时期英语教育的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运用文献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以外,还运用了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学者力主的因素分析法。萨德勒指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不能孤立地研究教育中的问题。康德尔则进一步强调:要把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 and 知识背景联系起来,从历史角度来分析那些形成教育制度的无形的、难以捉摸的因素和力量。——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中国英语教育的政策和英语教育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又是怎样呈现的?如此等等。

作者在研究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时候,能跳出身处所在学校视野的拘囿,深入考察相关问题发生、发展所深深扎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从而揭示它的历史规律。

该书的另一个值得肯定之处是文献资料翔实、细致。大量引用了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档案馆、香港浸会大学以及海外大学图书馆的第一手资料,并从《中国丛报》、各类学校的档案、校史、名人回忆录、教材等尘封多年的资料中,梳

2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

理出前人较少关注的问题,如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中国传统书院的英语教育等,从中比较全面而客观地展示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全貌。而其中对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大学英文专业教育成功案例的分析,能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文学教育与博雅教育对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明白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并为英语专业教育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个案与范本。

鉴于以上研究成果,陈雪芬博士的这本著作对当前英语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特为之序。

殷企平

2010年5月

序二

十多年前,陈雪芬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我曾教过她。十多年间,我们师生之间也像大部分的师生关系那样,随着学生在海内外四处飘散,相互的联系就基本靠缘分。2009年中秋之时我们俩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偶然相遇,那时我才获悉陈老师已经相继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与我成为同行。看到昔日的学生如此出息,虽然这完全是她的个人努力的结果,与我关系不大,但我还是像是自己有所成就那样感到非常欣慰,因此当她提出要我为她的专著《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作序时,我感到这不仅是我们师生之间可以续旧之事,也是我得以再次学习的机会,为此,我欣然答应。

外语教学界通常有两种方法寻找外语教育的真谛。一种是基于行为研究的实验法,即通过观察、实验、反思等的“实证”方法,探明外语学习和教育手段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基于叙事、文献、观察、体验等过程的智慧研究。这种研究通常以个人的经验、经历、叙述、或者是教育活动的历史材料为基础,从中挖掘出语言教育的真理。陈雪芬的《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属于后者。作者从400多年前广东、澳门的洋泾浜英语开始,一直追溯到当下的中国英语教学。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作者重点研究了19世纪以来的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梳理了这个阶段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教育体系,阐述了这些人物、事件对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影响,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史论结合,详略得当。书中有许多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其中穿插着作者精辟的点评,可读性很强,体现了新一代学者的功力。此书值得向广大的英语教师推荐,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更是会有裨益。

读完《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一书,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国的英语教育与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一场历史剧,它们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将一个落后、封闭的封建社会改造为一个正在迈向民主、科学、繁荣、富强的社会的历史进程,英语教育就是这几百年历史的缩影。

古代中国从地理位置上讲就是一个天生的封闭国家,它背靠青藏、蒙古两大高原,面朝东南波涛大海,这些高山大洋阻绝了它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联系,因

2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

3.2.2	书院的英语教育	(54)
3.2.3	新式学堂的英语教育	(57)
3.2.4	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后的英语教育	(59)
3.2.5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	(66)
3.2.6	维新新政时期英语教育之剖析	(70)
4	欧风美雨下的英语教育	(72)
4.1	中学英语教育	(72)
4.1.1	中国本土中学的英语教育	(72)
4.1.2	教会中学的英语教育	(88)
4.2	高校英语教育	(97)
4.2.1	中国本土大学的英语教育	(97)
4.2.2	教会大学英语教育	(114)
4.3	欧风美雨下英语教育特色评析	(125)
5	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英语教育	(127)
5.1	社会背景及其对英语教育的影响	(127)
5.1.1	苏联模式与英语教育的缩减(1949—1955)	(127)
5.1.2	社会主义建设与英语教育的回复(1956—1965)	(129)
5.1.3	“文化大革命”与英语教育的停滞(1966—1976)	(134)
5.2	中学英语教育	(136)
5.2.1	教学大纲	(136)
5.2.2	教材分析	(139)
5.3	高校英语教育	(143)
5.3.1	英语专业教学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	(143)
5.3.2	教材分析	(146)
5.4	意识形态与英语教育的关系	(154)
6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英语教育	(155)
6.1	改革开放与英语教育的复苏	(155)
6.2	中学英语教育	(158)
6.2.1	教学大纲的变化	(158)
6.2.2	教材分析	(162)
6.3	高校英语教育	(164)

6.3.1 英语专业教学计划的变化	(164)
6.3.2 英语专业教材分析	(169)
6.3.3 大学英语教育	(174)
6.4 改革开放与英语教育的关系	(176)
7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	(178)
7.1 全球化与英语教育的新趋势	(178)
7.2 中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179)
7.3 高校英语教育	(183)
7.3.1 高校英语专业教育	(183)
7.3.2 高校公共英语教育	(188)
7.4 非国民体系的英语教育	(193)
7.5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育的革新与多元化	(196)
8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若干问题探讨	(198)
8.1 影响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因素	(198)
8.1.1 物质环境的变迁	(198)
8.1.2 政治环境的改变	(200)
8.1.3 文化环境的变化	(202)
8.1.4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03)
8.2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中的几个转变	(205)
8.2.1 教材的转变	(205)
8.2.2 教学方法的转变	(207)
8.3 中国英语教育应面对的几对关系	(209)
8.3.1 英语教育中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关系	(209)
8.3.2 英语教育中功用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210)
参考文献	(212)
后 记	(220)

发展的概况,语种包括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主要关注的是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情况,该书提供了较多资料性、文件性的材料。上述著作主要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外语教育的情况,而不是中国英语历史的专题研究。

第二类为有关中国英语教学史方面的研究,其代表性的著作有三本。第一本为李良佑(1988)著的《中国英语教学史》,全书共40万字,详细论述了从清末到1987年中国英语教育发展历程。该书的特点是“倾向于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广泛地收集、引用史料,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客观地论述某一时期教育政策的成败得失”(许国璋,1989)。该书重点偏向介绍英语教育历史进程,而较少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来分析中国英语教学的演变,并且对中国近现代英语教材、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则涉及很少。第二本为哥伦比亚大学王小平(Wang Xiaoping,1992)的博士论文《中国英语教学的起源与发展》,该论文分五部分简单地介绍了中国英语教学发展的历史。由于全文用英语写的,为海外人士了解中国英语教学提供了一个窗口。第三本为华盛顿大学沈礼军(Shen Lijun,1993)的博士论文《中国英语教学历史》,该论文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于《中国英语教学史》和《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故事》,也是按时间顺序将中国英语教学发展史分成五部分。研究内容比较泛,主要介绍了各阶段英语教学情况,对一些教学方法作了简单的介绍。

第三类为有关中国英语教育某一阶段或某一问题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苏州大学顾卫星(2001)的博士论文《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此文陈述了晚清英语教学的历史、教学观念和实践、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个案研究和晚清英语教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借鉴,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晚清的英语教学,属于英语教育史的阶段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周兰(Zhou Lan,1999)的博士论文《1949年以来中国英语专业课程的发展和变化》,该文主要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课程设置以及教材编写的情况,以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个案进行分析。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詹妮弗·乔特(Jennifer L. Trouter)的博士论文《语言、文化以及政治:英语在中国1840—1990》,她从关系学的角度描写了文化、政治以及外语学习三者之间的关系,对150多年的英语教育进行分析。她主要采用访谈式,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英语学习者的经历进行调查。1998年,香港大学鲍勃·亚当逊(Bob Adamson)的博士论文《英语在中国:1949—1994初中课程研究》,运用课程学理论,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学等角度,结合翔实的个案、名家访谈等方法分析了1949年到1994年初中英语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演变。作者多年从事中国英语教学研究,曾作为外国专家参与我国基础英语课程大纲的建设和教材的编写,因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英语教学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教材内容的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2000年,堪萨斯大学特丽莎·麦凯西(Teresa J. McCathy)的博士论文《从禁语到必修语言:1979—1999中国英语教学变化》。作者根据自己作为外教在中国的经历来看待中国的英语教学问题,她根据英语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将20年的历史分成5个阶段,分析了影响英语教学变化的政治因素,还对自己在浙江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

《联盟法案》下统一,国名正式定为“大不列颠王国”),故《澳门记略》中的“英吉利”一名显然译自葡语(马廉颇,2003:22)。

19 世纪之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逐渐取代葡萄牙这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广州、上海成为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并作为一种优势媒介语的英语演化出的中英混合语应运而生,中葡混合语“澳门葡语”因此而失去其重要地位。“澳门葡语”是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产物,也是第一批西方殖民主义者渗透中国的副产品。

2.1.2 广东英语

早在 15 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探寻通往中国的道路,希望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 年)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殖民扩张思想广泛传播,印发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找到通往中国的新航线。从 1576 年开始,英国的商队便不断探索通往东方的航路。1588 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一举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后起的欧洲海上强国。1600 年,英国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旨在向东方进行有计划、有规模的经济掠夺。英国在南洋群岛、日本等地开展贸易,于是与中国建立起频繁的间接贸易关系。1637 年,约翰·威尔逊(John Weddel)船长率领四艘英国船队首次到达中国广州,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通商关系,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揭开了明清时期中英关系的序幕。1685 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当时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中占首要地位。1699 年(清康熙三十八年),英国船只“马克来斯菲尔德”号第二次进广州港,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印度棉花和檀香等;中国输英的主要商品有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同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到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之后英国到中国的船只日益增多。1715 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通常由 12 个管理商务的代理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一般由三四个职位较高的成员组成一个特派委员会,直接受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领导,这个特派委员会的首领,中国人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记载:“1715 年,在中国沿海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语言……”直到 18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中西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已占全部中西贸易额的 80% 以上。英语地位压倒葡语,于是产生以广东土音注读英语的所谓“广东英语”(西洋人称为 Canton English),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英语”代替“澳门葡语”。按广东英语也称“Pidgin-English”,“pidgin”一词为“business”(生意)一词的讹传,两者合起来意为商业英语。这种“广东英语”为汉语和外语混杂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关于“广东英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 18 世纪 40 年代的一

里,杨少坪指出学习英语与汉语有别,汉语是以字组词,而英语有词无字(所谓“字即语”者),要使英语说得地道,先要单词发音正确,又要遵守语法。租界里的一些洋泾浜翻译,由于没有语音与语法知识,所说的只能是杜撰英语。这百首竹枝词就从用词与语法方面来分析其错误,以便人们学习正规的英语。与此同时,他也列举了上海洋泾浜的一些例子:如“温”(one)就是“一”;“多”(two)就是“二”;“可牢基”(clock)就是“自鸣钟”;“来司”(rice)即使“饭”;“野路”(yellow)就是黄色;“讨克”(talk)就是“谈生意”。“谷猫迎”即 good morning(旧沪语“迎”读作 ning);“好度由途”即 how do you do;“肆鬼肆”即 squeeze(敲诈);“密四特”即 mister。

作为中外交流媒介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不仅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间交流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当时来华的英美人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就连其他国家来华的商人和游客也用它来交流。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多次在中国的战场和官场沉浮,1862年他娶了上海金融家“泰记”杨坊之女为妻。华尔只能说几句结巴的汉语,杨坊和他的女儿都不谙英语,洋泾浜英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桥梁。一些文学作品也运用中国洋泾浜英语以实现写作的目的。在勃姆(Bohem)的《来自贵族的军队》(Of the Nobel Army)中,女主人公,一位中国妇女使用了一些洋泾浜英语如:“You no go outside!”(You can't go outside! 你不可以出去)“You go outside, you quick die”(If you go outside, you will be killed at once. 如果你敢外出,你就会被打死)。(马伟林,2005)

表 2.1 洋泾浜英语释例

洋泾浜英语	标准英语	中文译意
Maskee	Never mind	没关系
Talkee he	Tell him	告诉他
Pay my	Give it to me	把这给我
Byebye makee pay	I'll pay later	我马上付钱
Walkee-walkee fish	Live fish	活鱼
Three piece man come dinner	Three guests come to dinner.	三个客人来吃饭
This price b'long true?	Is this price genuine?	是这个价吗?

进入 20 世纪后,上海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精通英语的人才越来越多,加上大批留学生回国,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主流社会淡出,但在普通百姓之中,甚至一直到今天,上海人方言中还留有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不少洋泾浜语又蜕变为上海的日常用语,如“老虎窗”(roof window)、“拿摩温”(Number one)、“枪势”(chance)、“瘪三”(beg say)、“阿飞”(fly)、水门汀(cement)等。中国洋泾浜英语最初产生于西洋的物质与文化处在“强势”,而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处于“弱势”之际。在上海租界这个中西交流最为频繁的开放地区,风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周毅,2005:70)可以说租界不仅改变了上海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同时也使中西语言与文化交流、传播成为可能。

稣复活后对十一个门徒的训喻：“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住，直到世界的末了。”（中国基督教协会，2005）因此传教成为信徒和教会的神圣职责，《圣经》中有关主耶稣和门徒保罗布道活动的描述，也成为后世信徒宣教的典范。然而要使传教活动得以大规模地进行，必须具备某些历史条件。在信徒时代，传教活动还是个人的行为。地理上的阻隔、交通的限制、语言的障碍和经费的匮乏，大大限制了传教活动的展开。（史静寰等，2000：37）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盛。当时中国海禁未开，奉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与外洋国家往来。除了极有限的朝贡形式的外交往来外，中外由海路来通商，只限于地处南隅的广州一口进行。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曾下令禁教，“各省西洋人除了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改为公馆，误入教者，严行禁”。此后，清政府在法律上一直禁止华人向外国人传授华语，且有非经商洋人不得久住广州等法令。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受不同宗教组织的派遣秘密地来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英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7世纪开始英国便开始关注中国，争取与中国建立联系，并将这个东方大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中国政府的不合作政策使英国的计划落空，但是英国政府还是继续派来华使团。1793年8月马葛尔尼抵北京，向乾隆提出了7条要求，其中包括允许英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的内容。将传教正式列入政府使团的缔约要求反映了英国教会对中国强烈兴趣以及希望来华传教的迫切愿望。18世纪末，一方面受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海外殖民活动所推动，英国国内纷纷成立了赴远东传教的不同基督教宗教团体，如：1795年成立的“伦敦差会”、1796年成立的“英格兰差会”以及1800年成立“基督教差会”等。

1807年9月4日，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受伦敦基督教新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派遣，搭乘美国商船，辗转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他是伦敦差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当时，伦敦会给马礼逊（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2004：25）的书面指示是：“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凭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境遇中方便行事。愿上帝保佑你，使你能将在英国所学到的有用知识，传授给你周围的人。我们也希望你找到机会使用你的数学知识，在中国进行分门的讲学。你也可教中国人英文，这将使那些跟你学英文的中国人得到很大的益处，他们可以跟陆续前往中国居住的英国人，或偶尔访问中华帝国的英国人进行交流……我们相信你能留在广州，一直待到完全学会中文为止。然后你可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能够直接阅读《圣经》。”因不能公开传教，他只能隐匿

于广州的美国商馆,暗中聘请两位老师教授粤语和中国官话。马礼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躲在密封的小房间里,奋力学习中文,为的是了解中国情况并为将来的传教事业做准备。

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结婚。此后,他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并以商人的合法身份居住广州。在取得了合法居留中国的地位,并且在逐步掌握中文之后,马礼逊便开始实施他传教的使命。但是,他发觉传教工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首先,中国政府明确规定外国人在华传教为非法行为,因此,私下传教是极其危险的。其次,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只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到广州进行贸易,根本接触不到一般的中国百姓。和他经常往来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从事交易工作的行商、少数受雇于洋商或从事清洁工作的苦力等,这些人早已成为他早期传教的主要对象,想要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是很困难的。

为了协助马礼逊的传教工作,1813年,伦敦会派遣另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华。鉴于清廷的传教禁令,他们决定将传教重点暂时放在南洋一带的华人身上,然后逐渐地向中国内地发展。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米怜决定改变传统传教的方式,采用兴办学校、传播西学的手段来达到进一步传教的目的。1815年8月,米怜在马六甲开设了男童免费学校,即作为英华创校的预备。创校的经费由马礼逊本人捐献一千镑,同时还得到东印度公司每年捐助一千二百元的支持。1818年初,马礼逊致函伦敦教会,提出创办马六甲(今雅加达)书院的设想,他说明建立书院的目的是“向中国青年教授英语和基督教基本原理,特别是为传教士和其他人提供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教育……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基督教的国度,文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Brian Harrison, 1979: 35)。学校最终定名为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同年开学。米怜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①

根据马礼逊、米怜等所拟《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规定:本校命名为“英华书院”,其目标为:实施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字。一方面令欧籍学生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字;另一方面使恒河以东国家的学生学习英语和西欧文学及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印支及中国东部诸藩属如琉球、高丽、日本。本校所授科目最终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系统地教授学生基督教的真谛和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英华书院十分重视中西语言及文化交流,根据学校报告,书院图书馆在18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占2850册,其余均属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的语文。它在当时可以算是东南亚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高时良, 1993: 43)

^① 早期的教会学校, [EB/OL] http://www.chinaxq.com/html/2005-10/28/content_4755.shtml.

在师资方面,书院聘请懂中文的欧籍教授,担任西方知识的授课任务,还聘请中国人担任助教。欧籍教授必须是基督教徒。书院的招生对象为:欧洲各国或美国大陆来的任何学生,只要他们是基督教徒,携有所属教会介绍该生的人品和志愿的推荐书,都可申请入学。此外,欧洲各大学内享有旅费的人员,基督教的传教士,贸易公司职员或各国馆内的官员,也都可以申请入学。恒河以东国家的本地青年,或自费,或由教会团体派送,或由私人资助来本校学习英文者,都可以申请入学。本地青年入学不需要是基督教的。本校也不强迫他们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只是邀请他们自由参加。

在课程设置上,对于欧籍学生,除必修中国语文外,根据学生的志愿选修宗教、文字、经济等科目;对于本土学生,以英国语文教授地理、历史、数学及其他有关学术和科学的各种科目为主,如时间许可,还教授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马来文等。(马礼逊夫人,2004:25)书院采用西方通行的教学方法,按学生水平高低分班、分级教学,通常把学生分为高级班(一班)、二班、三班、初级班(四班),同等水平的学生在人数极多情况下又分为若干小班;采取中英双语教育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们为学生开设了相对完整的英语课程:英语、语法、写作、口语、翻译等。学生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原版的英文教材如《缀字课本》(English Book)、《历史》、《地理》、《英文讲义》第一册和第二册以及与基督教方面有关的书籍《圣经》、《简要英语语法》、《中英语法》、《科技对话》、《中英习惯用语》等。

开学第一年,学生人数只有7名,以后逐年递增,即1821年10名;1822年16名;1824年24名;1827年达30名。学生人数在1835到1839年达到最高峰,数目超过70人。(高时良,1993:43)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霸占香港。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以便于向华人传教和传学。次年,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英华书院历任的校长共8人,第一任校长为米怜,其后则由宏福礼、高大卫、德修、伊云士、理雅各、马约翰等相继任校长。

英华书院是由西方新教传教士为华人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它强调英语教育,奏响了教会学校在中国英语教学的先声。英华书院不仅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传播西学以及传教事业人士,如袁德辉^①、何福堂^②等人,其英语教育还对以后创

① 袁德辉,四川人,1824—1827年在英华书院专攻英语,毕业后曾任北京理藩院通事和林则徐手下翻译,是林则徐了解外情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参与林则徐组织的一系列翻译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摘译1758年瑞士人滑达尔(De Vattel)所著《国际法》一书有关交战国之间实行封锁与禁运等方面的段落,这是我国翻译国际法的最早译文。

② 何进善(又名何福堂),广东人,20岁进英华书院时已略通英文,毕业后一直为传教事业服务,按立为伦敦会的华籍牧师,然后到香港工作,他帮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他的儿子何启,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曾留学英国习医及法律,对西洋文化有深刻认识,并积极鼓吹中国的西化改革。

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收回利益。”由于清政府禁止传教和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差距,使早期的传教士的传播福音工作十分困难。正如 1854 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69:342)所说的:“教会学校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式。”

美国传教士率先在华办起了教会学校。第一所学校是 1830 年 2 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只招收了四五名学生,该校招收学生学习基督教教义与英文。学生在帮助裨治文翻译基督教教义和编辑《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学习英语,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早期中国传教士梁发的儿子梁进德。裨治文曾打算刻意栽培梁进德,使他精通中、英及希腊文,以便协助圣经的翻译工作。但后来,梁进德不愿从事传教工作,转而受聘于中国政府,协助洋务工作。他在鸦片战争前曾助林则徐了解西洋事务,其后加入中国海关。因为他在翻译上很有成就,并能用英语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一直得到朝廷的重用。(其实这也是包括南洋在内的早期传教学校毕业生的其中一条出路。他们若不是从事传教工作,就有可能加入中国政府的涉外洋务机构,或外国驻华的使馆及洋行,利用他们的英语知识,充任翻译或买办等职。)贝满学校在 1834 年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事件之后停办,但是它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

1840 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满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终于被西方的大炮所轰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教育也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渡。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到 1860 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 7.7 万余人,传教据点有 400 余处,传教士约 50 人,天主教小学 90 所;基督教传教士约 100 人,教徒约 2000 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 50 所,学生 1000 余人。

表 2.2 1842—1860 年在中国建立的主要教会学校(顾卫星,2001:9)

创办年份	创办者	国别	创办地点	学校名称
1842	浸信会	美国	香港	宏艺书塾
1843	伦敦会	美国	香港	英花书院
1843	美部会	美国	香港	浸礼会女校
1843	圣公会	英国	香港	圣保罗书院
1844	东方女子教育会	英国	宁波	女子学塾
1844	伦敦会	英国	厦门	英华男塾
1845	长老会	美国	宁波	崇信义塾